

做好“六稳”工作 落实“六保”任务

# 云南打造五大万亿级支柱产业

本报记者 曹松

日前,《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决定》出台,提出要重点打造以先进制造业为首的五大万亿级支柱产业,到2025年先进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达1.5万亿元,到2035年形成一批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制造业是一个地区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以烟草为代表的轻工业大放异彩,冶金、化工等重工业相继崛起,形成了云南制造业的基本格局。”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陈钟耕介绍说,2019年,云南制造业营业收入近1.2万亿元,占全省工业81.5%的体量,已经成为云南经济的重要支柱。

云南打造万亿级先进制造业,重点抓好产业基础再造、重大技术改造、智能制造和服务型制造四大工程,从存量和增量两方面下功夫。在信创产业方面,云南引进了航天科工、浪潮集团等企业,计算机总产能将达到160万台套;在绿色硅材方面,隆基、合盛、通威等企业相继落地,形成了保山、楚雄、丽江、曲靖、昭通5个水电硅材聚集区。目前,云南已有9个国家级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21个省级示范基地,为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奠定了基础。

近日,记者走进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看到企业生产、打包、装车的繁忙景象。据介绍,

今年前10月云内动力发动机销量达47.69万台,同比增长51.13%,实现营业收入171.4亿元。“通过多维度创新驱动、全渠道营销战略,我们克服疫情冲击,迎来逆势增长。”云内动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波说。

云南一方面用新技术、新模式优化提升钢铁、有色、建材等传统行业,补齐短板;另一方面,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新业态,培育先进制造业新动能。今年6月,北汽昆明新能源汽车基地实现量产1000台,填补了云南新能源乘用车制造的历史空白。北汽云南瑞丽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虎介绍,公司正朝着今年底实现产销1万辆、产值20亿元的目标冲刺。

陈钟耕表示,下一步云南将“存量变革”和“增量崛起”有机结合起来,不断做好“优存量、扩增量”两篇文章,为云南先进制造业的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近年来,经过探索与发展,怀化的中药材产业逐步告别了单一模式,初步形成了集中药种植、新药研发、制造包装等于一体的产业体系,基于中药材产业的优势,吸引越来越多的大健康项目汇聚于此,并顺势布局环环相扣的大健康产业。

怀化促进中药种植与加工、医疗与养老融合、医疗与文化旅游融合、食品与健康融合,形成布局科学、产业集聚、链条完整、业态丰富、产品多样的大健康医药产业发展格局。与此同时,怀化以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公益性服务与经营性服务相结合,建立起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预计到今年年底,怀化居家养老服务设施覆盖所有城市社区、90%以上的乡镇、60%以上的建制村,健康养老服务信息平台覆盖所有的城镇社区和50%以上的农村社区。

群策群力、源头预防、抓早抓小等“枫桥经验”基本原理植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推进基层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建设,走出一条自上而下的专责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相结合的基层纪检监察工作新路径,有效打通全面从严治党“最后一公里”。

“我们将创造性发展运用‘枫桥经验’,深化提升基层纪检监察规范化建设,使基层监督由原来伸出去的‘一根手指’,变成有力握紧的‘一个拳头’,努力打造基层纪检监察监督‘绍兴样板’。”绍兴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陈灿表示。

2020年第一批国家火炬特色产业基地、大湘西区域医疗中心落户怀化为契机,加快构建集药材种植、加工、研发、销售、物流配送等一体化全产业链中医药健康产业体系。

依托中药材资源和国家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目前怀化已建成4个医药产业园区。“今年我们主要展示以茯苓为原料的健康食品,比如茯苓霜、茯苓饮料、茯苓糕点等,这些产品更加贴近老百姓的日常健康保健。”湖南补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公司连续五年参加健博会,拥有多项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目前拥有国家发明专利21项,国家及行业科技进步一等奖5项。

# 湖南怀化培育医养健康产业链

本报记者 刘麟 谢瑶

近日,2020武陵山(怀化)国际健康产业博览会暨第二届怀商大会落下帷幕。大会共签约重点招商引资项目24个,总投资436亿元,签订产销采购项目14个,金额3.54亿元。

湖南怀素有“药材之乡”的美誉。“依托丰富的中药材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怀化正跨步向大健康时代迈进。”怀化市委书记彭国甫介绍说,医养健康产业是怀化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用科技扮靓生态名片的一个重要抓手,是怀化重点培育的千亿级产业。

怀化市委、市政府先后出台产业发展的扶持政策,同时,以怀化高新区中医药特色产业基地获批

#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探索实践基层纪检监察监督新路径研讨会举办

本报讯 记者柳文、通讯员周国勇报道:11月27日至28日,创造性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践基层纪检监察监督新路径研讨会在浙江绍兴市举行。研讨会由绍兴市纪委和浙江大学联合举办,

来自中国社科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就“枫桥经验”实践融入基层纪检监察工作、推动基层监督治理现代化展开探讨。

近年来,绍兴创造性发展运用“枫桥经验”,将

## 智能制造 提质增效

近日,位于安徽省桐城市的安徽攀登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车间里,员工正在托辊生产自动线上忙碌。近年来,桐城市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改造升级传统产业,推进智能化项目建设,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发展水平,目前已形成了绿色包装、机电装备两大首位产业以及新材料、汽车部件等优势产业。

江胜摄(中经视觉)



## 贵州黔南州龙里县水利扶贫出成效——

# “水困村”变成“幸福村”

本报记者 王宝会

“天天挑水下锅,来回要走十里路。”今年已经70岁的高坪村水管员陈光明,对村里当年缺水的情景记忆犹新。地处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龙里县的高坪村地势较高,山高谷深,一直没有稳定水源,550余户居民的人畜饮水要到相邻的贵定县冒沙井用马车拉。“下河挑水、马车拉水,雨天急忙收集雨水,祖祖辈辈一直喝着‘望天水’。”陈光明告诉记者,为了给家里的老人挑水吃,村里的年轻人不敢外出打工,由于没有收入保障,群众的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

解决水困问题已经成为高坪村村民心中的“头等大事”。

怎么办?先要找水。2001年,高坪村村民上山采药,在贵定县六公里外的山上找到了稳定的水源,经过洽谈后,花8800元买下水源使用权,这是龙里县最早的“水权交易”。

有了水,如何让大伙方便地用起来?这就需要修管道。“龙里县水务局通过‘渴望工程’项目集中筹措20万元资金购买管道材料,村民积极投工投劳,主动开展施工作业。2002年7月该村人饮工程初步建成通水,结束了天天挑水喝的苦日子。”黔南州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水利部挂职干部李斌说。

要想水喝得长久,还得有人管。深知水来之不易,一滴也不能浪费,平时他经常参与村里组织

易,高坪村当即召开村民大会成立水管委员会和群众监督小组,选出3名水管员,并制定高坪村人畜饮水管理制度。陈光明告诉记者:“管好水才能更好地用好水。水管员必须随时检查主管道线路,一旦发现漏水、线路塌方,要及时向水管小组反映,尽快维修,保证群众用上放心水。”

维护的资金从哪儿来?还得“以水养水”。近年来,高坪村人饮工程持续稳定发挥经济效益,形成“定额保底、阶梯水价、分类收费、定期公示、结余归公”的管水模式。“每月保底2吨水,8吨及以下每吨水收3毛钱,超过部分每吨水收1元钱。”陈光明说,村里给“五保户”和学校免费供水,剩余的水以每吨3元的价格供给村周边的小企业,这样村集体既可以增加收入,村民也实现了就近务工。目前,村集体账户上水费结余达13万元,这笔钱专门用来更换管道等的维护开支,不仅不用伸手向政府要钱,还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以水养水”,曾经的“水困村”变成了如今的“幸福村”。

苦尽甘来,高坪村村民终于吃上了放心水。记者来到村民杨继民家,拧开他的水龙头,只见清澈的水哗哗地流了出来。“洗菜做饭很方便,再也不用起早贪黑挑水了。”杨继民说,这水来之不易,一滴也不能浪费,平时他经常参与村里组织

的节水宣传活动,这些活动不仅培养了村民节约用水的习惯,还提升了村民参与管水护水行动的积极性。

龙里县认真总结推广高坪模式,创新推出“三个三”管水模式破解农村管水难题,取得了明显成效;推进农村河湖综合治理,改善农村水环境,助力乡村振兴。截至目前,龙里县建成农村饮水工程418处,覆盖人口145.9万人,其中贫困人口2.02万人,实现了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全覆盖。县里还成立村级水管委员会159个,选聘农村水管员200多名,拟定村规约781个,进一步强化了农村饮水管理工作。2018年,龙里县退出贫困县序列。

高坪村的“水故事”也是贵州省实施全面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攻坚战行动的缩影。从2016年起,贵州省稳步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实现从“喝水难”“喝上水”到“喝好水”的转变,切实保障农村群众饮水安全。贵州省水利厅厅长樊新中表示,为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贵州省水利厅聚焦滇桂黔、武陵山、乌蒙山三大集中连片地区主战场,组建18个定点工作队以“9+3”县区为主攻点,深入推进68个县水利扶贫督导,持续在政策、资金、项目等方面倾斜支持,抓好民生水利工程建设,提升农村饮水安全成果。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全国已建成农村供水工程1000多万处,覆盖农村用水人口9亿多人,截至今年9月底,全国农村集中供水工程已收费工程占90.3%,千人以上工程水费收缴率95.5%,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良性运行机制逐渐形成。

# 为中国卫星通信倾注一生

——记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首席专家、第五十四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孙晨华

本报记者 曾诗阳 常理

30多年来,卫星通信融入了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首席专家、第五十四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孙晨华的生命,她深度参与我国宽带、移动、抗干扰卫星通信全体系研制建设,是我国卫星通信领域的带头人之一,为实现我国卫星通信由依赖引进到自主研发、中国创造的重大转型作出了突出贡献。日前,孙晨华被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在卫星通信领域,欧美国家比我国起步早了几十年,市场长期被国外垄断。孙晨华下定决心,要研制出自主可控系统,让中国卫星由弱变强。她和团队自主创新研制宽带点对点向多点组网、单波束向多波束组网、单星向多星组网的三代系统,使我国在该领域由跟跑到并跑,再到某些方面能够领跑世界先进水平。

此外,孙晨华主持研制了我国首个自主知识产权的中速率宽带网状组网卫星通信系统,实现了256个站同时在线,16Mbps单网吞吐量,地球站单波束单跳约5000公里的第一代宽带组网系统能力,

结束了我国同类系统全部靠进口的历史。

回顾攻坚历程,困难数不胜数。“吃不了苦,耐不住寂寞,坐不了冷板凳,就难出成绩。”孙晨华认为,做研究首先要有坚韧不拔的毅力,要有一辈子坚持做一件事的精神,其次要不断学习,跟上社会发展,扩展知识面。

从“十五”到“十三五”,孙晨华主持了我国多个宽带卫星应用运控系统研制和研制项目,突破几十项关键技术,开发高新技术产品百余种,总体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多项技术国际领先,产品已应用到军民贸各领域,近5年创造效益70亿元。

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先进工作者……在孙晨华眼中,成绩和荣誉并非终点,而是新起点。她表示,将不忘初心,继续奋战在我国独立自主全球覆盖卫星通信网络建设的征程上,倾注一生推动卫星通信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领跑。

## 劳动者之歌

(上接第一版)

我们树立和坚定法治体系自信,实质上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必然延伸。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必须不断完善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这些子体系环环相扣、彼此联结,内在统一,共同构成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纲”,纲举才能目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理论构建和制度设计,不仅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方面具有重大创新价值和实践意义,而且在当代世界法治文明理论和法律制度建设作出独树一帜的中国贡献,我们对此要充满信心、坚定自信。

## 四、树立文化自信,坚定不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体人民意志和党的主张相统一、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与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相统一、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与全面依法治国实践相统一、法治宣传教育与培养法治行为习惯相统一的集中体现。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由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法律意识、法治信仰、法治知识、法治习惯、法律行为、法治文艺、法治宣传、法治(法学)教育、法治环境、法治氛围等构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成果,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精神家园和文化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努力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了加强和深化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完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律政策体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全过程,

融入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各环节,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深入人心,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价值引领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

我们树立和坚定法治文化自信,实质上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自信,必须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汲取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精华,吸收借鉴人类法治文明有益成果,坚决抵制西方错误思潮和错误观点影响。

总的来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法治理论、法治体系、法治文化“四位一体”,从属并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和文化的法学和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法治理论、法治体系、法治文化也是一个有机整体,它们相互作用、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方向指引、理论支撑、制度保障和文化根基,深刻蕴含和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体系自信和文化自信。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奋力开启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新征程,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法治理论、法治体系、法治文化“四位一体”,毫不动摇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自信、法治理论自信、法治体系自信和法治文化自信。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